

粤剧传奇:永不止步的红线女(3) ◆ 邱杨 王玄

严师慈母

在入室弟子郭凤女眼中,红线女既是严师又是慈母。“1972年广东省‘五七’粤剧训练班在广州市郊元岗创办。从那时起,我的启蒙老师就是红线女老师。”郭凤女告诉本刊记者,当时自己年纪不过11岁,甚至都没有听说过粤剧。“我是第一批招来的15个学生之一,当时我们这批学生中最小的10岁,最大的也才12岁,都是穷苦人家出身。”

“这6年的训练是很难忘的,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子开始,红老师手把手地教我们练功,学正音,由番禺方言改正发音,学习发声。说实话,我们当时既尊重她又有点怕她,她自有一种威严在。”郭凤女尤其记得,“在我变声期,当时我学唱《海港》,‘忠于人民忠于党’那唱段里有一个高音,我总是上不去。上完课,红老师就叫我留下来,她说,‘我来看看为什么你的高音总是上不去’。我就唱给她听,然后老师就教我怎样用气,‘不要用喉咙,声音应该是放出来,越高音的时候就越要将声音给托住……’”

在郭凤女记忆中,每逢周日,红老师还会亲手在饭堂做糖水给大家喝。“我们每个月有10块钱的补助,还可以吃到巧克力、牛奶、麦乳精,这在那个年代算是很奢侈的食物了,普通家庭的孩子很难吃到,这都要多谢谢红老师申请的。”郭凤女说,“后来训练班改名为广东粤剧学校,直到现在。要是没有她当初提倡重新招生培养粤剧人才,就没有粤剧学校的今天,甚至很可能出现粤剧人才的断层。”

“老师收我当入室弟子是在



■ 红线女与同行在交流

1984年,那时候我在广东粤剧院演了几年,很想换一下环境。当时老师在广州市粤剧团,我就找老师说,‘可不可以回到你身边呢?’老师就说好。”从1984年开始,郭凤女就住在红老师家里。“我们一起买菜做饭,我切菜打下手,老师炒菜,她会问我今天在红豆剧团排练怎么样。我就唱给她听,她就告诉我这句该怎么唱……一边炒菜一边教我。”3年后,郭凤女从红老师家中出嫁。“我自己的母亲去世早,这么多年来,我把红老师当亲生母亲看待。她也很疼我的女儿,吃饭时身边的两个位子总是特地留给我和我女儿。”提起恩师,郭凤女仍然难掩悲痛。“她对我的影响很大,没有她就没有今天的我。老师不在了以后,我这段时间脑子里都是空空的……”

直到去世前一天,红线女还在为学生讲课。“11月26日我们广东粤剧学校七八届40周年志庆晚会在中山纪念堂举行,红老师亲自担任艺术总监,这几个月来我们总在一起商量晚会的策划和节目排练。演出结束后,她跟我说,还有话想跟参加演出的年轻学生们聊。我就安

排在12月7日星期六,把30多个学生带到了红线女艺术中心。”郭凤女告诉本刊记者,“那天她的腰很疼,她是用力按着我的手才站起来的,手冰冰的。小剧场里的座位太矮,她腰疼坐不了,就直接坐在舞台边上,我也陪她坐在旁边。”

“那天从上午10点开始,老师一直讲到12点半。11点钟时,我就问要不要歇一歇,她连说两个‘不用’。眼看着又要到12点,我怕老师身体撑不住,就说到吃饭时间了。她还开玩笑说:‘你看你多馋,只知道吃饭。’直到12点半,我硬拦着不准她讲了才结束。”郭凤女说,“她拿着词,一句句地教学生唱唱段,每个人物应该是什么样。每一句词,每一个人物她都讲到了,非常细。实际上,我知道她那天身体是很不舒服的,但她的毅力很棒,一直坚持了下来。”

“为粤剧鞠躬尽瘁,倾尽所有心血。”在郭凤女眼里,红老师总是这样敬业,这样热心。红线女的女儿彩虹曾经这样评价自己的母亲:“不管谁说想学粤剧,妈妈都马上表现得像吃蜜糖那样甜,恨不得将她所有的东西全部都交给你。”而陈列东则告诉本刊记者:“只要你爱粤剧的,她就肯定会爱你。”

忙碌晚年

虽然已经89岁高龄,但红线女几乎每天都要去红线女艺术中心上班,风雨无阻,全年无休。“她每天早上七八点钟起床,吃完早餐,9点钟从家里出发。”陈列东说,“到了就跟工作人员开会、读报。她每天至少要花一两个小时在看报上,一天要看6份报纸,即使去外地出差,她也不会落下。她的视力挺好,从头到尾都

是自己看,不需要人读。”

“她不服老,从来不喜欢人家叫她‘婆婆’,也不喜欢让人扶。”陈列东说,“有时候晚上演出结束了我送她回家,送到她家附近的小路上,她就说不用送了,然后自己蹭蹭地往前走,一边哼唱着一边跑,我追她都追不上。”在侄子邓原眼中,老人的性格颇为倔强,甚至刚烈,对于自己认为是对的东西很坚持。“我记得有一年她家进了小偷,把楼下的保姆绑了起来,那小偷上了二楼她的房间被她发现了,她那时已经很高龄了,居然和小偷搏斗,被小偷打昏了。当时小偷不知道她是谁,后来保姆挣脱绳子出去报警,等警察来抓住小偷,小偷的第一句话是:‘你们快去看那个老太太,她很厉害。’”

“但实际上,她是个很善良心肠很软的老人。”邓原记得,有一次自己坐在艺术中心门口随手翻接台台的信件,翻到一封信是一个中学生写给红线女的。“那个中学生家庭很困难,很想读好书,他的事情就登在《广州日报》上。我十姨(红线女)看了后,就送了一台电脑给他,这个中学生就写了封感谢信给她。”在红线女身边的工作人员对类似的事情都早已司空见惯,黄芳说,“她长期捐助小学、弱势群体,但她自己从来不提。”

热爱生活的红线女很爱侍弄花草树木。“在华侨新村的家里种了很多花,桂花、白兰花等等,还有木瓜树。有一年花开得特别漂亮,她还打电话给我说,能不能帮她马上买个照相机,她想把这些花都拍下来。”陈列东说,“她喜欢去捕捉大自然那些细微的神韵,将它记录下来。”红线女的家中现在还挂着她自己拍的照片。“她还养了一大缸金鱼,她每

天都要看差不多两个小时,上午看一遍,下午看一遍,她说看着金鱼们在那里游来游去,感觉很自由很舒服。”

“除了平时的生活,她聊得最多的还是粤剧,三句话不离本行。”陈列东告诉本刊记者,“我感觉她年纪越大,对粤剧的追求越强烈,责任心越重。虽然2009年粤剧‘申遗’成功,但实际上内地的粤剧市场并不景气。她总说,粤剧创作停滞很久了,现在演的都还是一两百年前的题材,现代元素完全缺失。所以我们有什么新剧本,她马上让我送过去,她一定要看,看完她就记录在那里,觉得怎么样,好不好,她都会提出意见。”

“红老师在很多地方都比别人快一步。”为了重新唤醒逐渐被小朋友们淡忘的传统文化基因,红线女花了4年时间,做出了全世界第一部粤剧卡通《刁蛮公主憨驸马》。“她说她跟许多小朋友打电话,问他们在干什么,他们总说在看电视,她希望孩子们能够花些时间从小开始接触粤剧,培养兴趣。对于从来没有参加过动画配音的红老师来说,对着动画形象唱戏也是一大考验。她还开玩笑说,年纪大了,或许舞台上的形象不行了,然而观众听听我唱曲还是可以的。”陈列东眼中的红线女非常重视粤剧的传承,红线女艺术中心也一直不断邀请小朋友来参观。“实际上离开了红线女,我们粤剧是很惨的。没人为粤剧说话,给予更多的支持。”在她离世后,陈列东和郭凤女都对粤剧的未来表示过担忧,“粤剧是我们岭南的一张名片,我们希望把她的艺术一直传下去。”摘自2014年2期《三联生活周刊》

爱:外婆和我

殷健灵



外婆把我抱进暖乎乎的被窝,又轻轻掖紧被角,才悄悄离开。外婆一把屎一把尿地把我拉扯大,我与她有着不可分割的深厚感情。

记得,那时,妈妈回上海探亲。

外婆让我和妈妈同睡一个被窝,可是不多久,我却蹑手蹑脚地爬到外婆身边——我要和外婆睡。

慈祥和蔼,不打我不骂我——这是孩提时代的我对外婆的印象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对外婆的认识又进一步加深了。外婆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型的妇女,在她身上有着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——朴素、勤劳。她数十年如一日,始终担负着繁重的家务。她自己说:“闲着就觉得难过,从小做惯了。”这并不是什么豪言壮语,可我觉得它恰好是外婆精神品质的体现。她不会说更多的话,但只这一句,便在我脑海里刻下了深深的印记。

外婆只上过一年学,她所认识的不过是“上中下”等极简单的字。可她却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,总是对我说:“好好读书。”每每这时,外婆那浑浊的眼里总会闪着希望之光;每每这时,我那幼小的心中总会升起一股“读好书,让外婆开心点”的欲望。

外婆又把门悄悄地掩上了,我已数不清这是第几次了。只要我在台灯下学习,即便有再好看的电视,外婆总是忍痛割爱,放弃她最爱的,也是她一天中唯一能从中得到娱乐的电视。

“长大了,我要好好报答外婆。”这也许是我最早的“理想”。现在,当我回想起小时的我,却总觉得阵阵揪心。由于外婆近似溺爱地疼我,使我在外婆面前又霸道、又任性。好像有那么一回,不知是为了什么,当时的我极其暴怒,把书包摔在地上,而且摔了好几下,接着又哭又叫,而外婆却一点都没被我的所作所为所激怒,反而显得不知所措,一个劲地哄我……如今想来,外婆应该狠狠打我一顿才对,对我的嚣张气焰应好好地压一压。越这样想,我就越觉得内疚,感到对不起外婆。

如今,外婆几乎天天都在我身边,我只有用体贴关心外婆,才能弥补我的过错。勤劳、质朴、慈祥、温顺,这便是我的外婆,我永远爱着的外婆。

37.人们奔走相告

县令咄咄逼人,不过李芝英想着,既来之,也就豁将出去,于是挺直身子,慨然说道:“民变皆由官激成,百姓抗官正是出于无奈。”段光清厉声道:“官府辖下,王道王法,你等何敢口出狂言,煽惑人心?”李芝英沉吟片刻,说道:“忍无可忍,走投无路之下,百姓只能孤注一掷。”

段光清踱了两步,又道:“历来所谓民穷盗起。鄞县地方民生安稳,长于教化,又怎么会一直随你等抗官作乱?”李芝英看着段光清说:“百姓穷则求生计,百姓足则求公义。”

段光清暗自欣赏李芝英的才学风骨,可是两人的话语却并不投机,段光清也就不想再多说什么了。眼下他最要紧的事情,是尽早结案,于其之下,既须尽少牵连瓜葛,以免节外生枝,又须谨防乱民的串结勾连。于是段光清说:“参与抗官作乱,该当何罪,你也知道。本官意下,唯在息事宁人,平息事端,还民生计。你一监生,原有才名,本官不愿你就此牵连进去,丢了性命。今日定在此处会你,也是为避人耳目,推心置腹。你若就此罢手,一切自可保全。如果执迷不悟,既是于事无益,届时本官也就不得不秉法行事了。”

听得此言,李芝英脸色僵硬,却又似五内俱焚。他恍惚半晌,长叹一声。昏昏沉沉,恍恍惚惚地仁立岸头,李芝英情不自禁,泪流满面。回去家中,赴湘探知情况的人带回消息:太平军眼下意在攻取湖北,暂时无暇东顾。李芝英只觉身心崩溃,由此卧床不起,大病一场。

城中的石匠铺,由县丞督办,刻日凿刻规格大小一律相同的条石,一体镌上“官立肩贩地界”的字样,又一日之内便在县境内靠近海边盐场的山田之间,包括五乡硇石山弄一带,全部凿立完成。此标记即允界内乡村人家用少许私盐。界内贫户小民纷纷拥到界石处,眉开眼笑,欢呼雀跃,以至放起鞭炮来。

这日县令段大人邀约了绅缙富户中有声望者,在城隍庙茶叙商谈。段光清道:“各位绅缙名宿体察时艰,体恤民情,本官极为感佩。既是如此,本官即取消红、白二封之规,粮赋作银,贫户原为3200钱作一两,于今降至2600钱一两。你等红封人家,原为2000钱作

一两,现也作2600钱一两。如此统一定价,你们以为如何?若你们说可,此事就这么定了。”大家七嘴八舌,却是认定了县太爷段大人所说。人之权衡利害,适时选择,也是人之常情。

于是,咸丰二年五月,鄞县即公告宣示,即日起统一定价开征赋税钱粮。鄞县乃至宁波由此轰动,人们奔走相告,欢呼庶民的胜利;同时又感念官府开恩,随之将县令段光清称之为“段青天”。日后咸丰帝召见段光清时,还问起过这“青天”称谓的来历。

段光清手中没有一兵一卒,仅以布告行政之权,使情势逐渐处于股掌之中。即日张贴的又一张告示是:鄞县民变作乱戕杀官军案,官府专拿周祥干、张潮青、俞能贵数人,其余概不株连。告示又称:拿住人犯之一名送官者,赏银800两;这可是三四万户农家耕作一年的所得。而若藏匿人犯不报者,严加治罪。人犯若有逃亡者,则家眷村人连坐。

市众乡民于各处见此告示后,均都沉默不言,或是叹息一声,也就散去了——县太爷如此数管齐下,也确实棘手,究竟是做顺民还是反民,是做良民还是堕民,大家就此自家决定去吧。可是不消说,天地可鉴,百姓乡民从来都是要给自己认定顺民良民的正身,有谁愿意自己是个反民呢?更别说是堕民了。

周韩村,横泾村和石山弄的乡亲村人当下捏紧了税银,赶往姜山、邱隘、五乡硇的镇公所交税。不料到了镇公所,税银却递不进去,统统被打回了票——原来凡上述三村的乡民农家,官府一概拒收其粮赋税银。话也说得明白:因为三村牵扯了那惊天大案,税银之事就先放在一边,以后再议。言下之意就是:不报不报,时候未到,这笔账到时候再来计较。

三村村民当即遭至当头一棒,不免跳脚吵嚷起来:我等百姓正经按照官府的告示章程,正大光明真金白银地交税,你官府却是不收,天下哪有这个道理!办事的税官与胥员也不急不躁,只说这是县太爷定下的规矩,我们只是照章办事;县太爷说了,你等有何道理,可直接去县城寻县太爷说去。

鄞变一八五二

徐牲民

